

王亞南著

政治經濟學史大綱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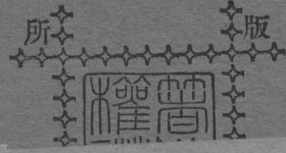
王亞南著

政治經濟學史大綱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
七月初版

七月發行
七月初版



分類號
登

著者 王亞南

發行人 李虞杰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大學用書 政治經濟學史大綱 (全一冊)



定價 二十元

(郵運匯費另加)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一四三九九)海

序言

直到現在為止，用「經濟思想史」，用「政治經濟學史」這類名色出版的著述，雖然不算十分稀少，可是依據這門史學，依據科學的歷史方法論來寫作的經濟思想史或政治經濟學史，却竟是鳳毛麟角，不易多見了。原來經濟學史這門學問，也如同其他社會科學史乃至一般文化史一樣，單把已有的現成材料，依照一定的方式，將其蒐集、拼湊、編列起來，原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用一位英國名文化史學家的話說：『任何一個著作家，不論其思想如何落後，天資如何魯鈍……祇須在數年中，稍事涉獵相當的書籍，即可妄列於史家之林，而撰述一部偉大民族的歷史。』（註——見(Buckle)著「英國文化史」上冊胡譯本第三頁）可是，如其歷史不只看爲是敘述事實，編排史料，而同時更著重在發現那些事實中的定律，或發現那些意識之流中的形成演變定律，則那種歷史的撰述，就真是談何容易了。

有關經濟思想或經濟學說之歷史的研究，曾被分別採行了各種的方式，爲了解說或批評的便利，我打算在不十分妥當的指出下列三個研究方式的時候，附帶把我手邊可以找到的國外有關著述，例舉出來。

第一是選集的研究方式 這有兩部書可以作爲例解：其一是查理士·布洛克(Charles S. Bullock)的 *Selected Readings in Economics* (1907)，其中所選論文或小著，係把每個有關問題下的不同意見，分別原原本本的選載出來。例如關於人口原理，集有羅姆林和馬爾薩斯的論著；關於分工原理，集有亞丹斯密和傑芬斯的相

反見解；關於資本蓄積原理，集有穆勒、巴斯夏及霍布生的不同意見……。這書的主旨，也許是當作經濟學的補充讀物，但却顯然大有助於經濟學史的理解。又其一是帕特生(S. Haward Patterson)的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932)。與前書比較起來，這部書更採取了經濟學說之歷史展開的形式。由亞丹斯密及其前後直接有關人物如曼德維爾、哈其生及薩伊等的著作選起，順次經經濟學史上各派以至美國亨利·喬治及帕騰等的著作止。可是如著者所聲明，他比較多選大著作家的小著作，或次等經濟學家的著作，或經濟學上異端的著作。這種選擇，也許是別出心裁的。

第二是部分的研究方式。這是就經濟學說史或經濟思想史上某一段或分野加以研究，就中又可大別為四個類型：(一)斷代的——如翁肯(Oncken)的「國民經濟學史」(Geschichte Nationalökonomik)，係講亞丹斯密以前的學說，高橋誠一郎的「經濟學前史」(國內已有熊子駿譯本)，希莫婁(Schmoller)的「重商主義及其歷史意義」(Das Merkantilssystem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 Bedeutung——國內有鄭學稼譯本)，穆爾頓(Nod D. Monton)由德文譯出之昂格爾(Surange Unger)的「二十世紀經濟學說」(Econom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國內已有宋家修譯本)等，特前兩者皆敘述現代經濟學成立以前的經濟思想，於研究嚴格的經濟學史，只在探源上有所益助。(二)國別的——如羅雪爾(Roscher)的「德國國民經濟學史」(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k in Deutschland)，闕南(Cannan)的「英國經濟學史上的生產理論與分配理論」(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y from 1776 to 1848)，及加田哲一的「德意志經濟思想史」(國內有周承福譯本)等。(三)部門的——如卡爾馬克斯的「剩餘價值理論」(Theo-

rien Über den Mehr Wert——國內有郭大力譯本在印刷中)，如里卜克內西(Liebknecht)、魯彬(Rubin)等分寫，爲孫寒冰、林一新合譯之「勞動價值學說史」，如龐巴衛克(Bahn-Bäwerk)著「資本及資本利息」(Kapital und Kapitalzins)中第1卷「資本利息學說史及其批判」(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Kapitalzins Theoriein)，如波多野鼎的「價值學說史」，高島素之著拙譯的「地租思想史」，谷口吉彥著陳敦常譯的「古典學派的恐慌學說」，又如蘇聯G·加茲羅夫編汪耀三譯「貨幣信用論教程」等。(四)代表的——如魯彬著嚴靈峯譯「近代西方經濟學家及其理論」，波多野鼎著彭迪先譯「現代經濟學論」，霍門(P. T. Homan)著于樹生譯「現代經濟思潮」(Contemporary Economic Thought)等，均係選定現代，特別是當代著名經濟學者的經濟學說，分別予以較詳細的評介，但同時還在相當範圍內注意其發展的線索。

第三是通體的研究方式 這是就採取了經濟學說史之通例研究形式的著述而言，但雖如此，有的著述雖已不受部分研究式中之斷代研究的拘束，但却未把經濟學史上各重要派別全般論到，所以爲了參閱的方便，這裏又就其包括範圍的形式上分作以次兩方面來說：(一)不完全的——如因格拉姆(Ingram)著胡譯「經濟學史」，僅由古代、中世講到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派，而中止於歷史學派，其中，奧大利學派還是後來由斯各特(William A. Scott)替他續上的，且根本就不曾涉及社會主義學派及其他。如魯彬著李韻琴譯「經濟思想史」，乃由重商主義的沒落講到古典學派的沒落，而對於其他奧大利學派、歷史學派、社會主義學派又未論到。河上肇著林植夫譯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說之史的發展」，只寫到約翰穆勒(John S. Mill)就結束了。住谷怡治著熊得山譯的「物觀經濟學史」，更只寫到李嘉圖。而佩蘭著楊心秋譯的「十九二十世紀經濟學說史」，則是從李嘉圖

寫到心理學派，並簡論及數學派、美國學派爲止。(二)比較完全的——如基德(Gide)和理斯特(Rist)合著英譯本的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有陳漢平于錫來的中譯本)，韓訥(Haney)的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有藏啓芳的中譯本)，斯各特的Development of Economics(有李炳煥的中譯本)，以及史盤(Ottmar Spann)著陳清華譯「經濟學說史」，羅森堡(D. Rosenberg)的「政治經濟學史」(國內有兩個不完全的譯本)等。

關於國外政治經濟學史研究的成果，上面舉述的當然只是一部分，而我將它歸納在上述三個研究方式中提舉出來，乃是要藉此說明那種種研究，並不能從形式體裁上判定其真實價值。對於一般青年研究者來說，較有分寸的選集讀物，比之不正確沒有原則的編著，也許還更有益處；而部分的研究方式，有的表現得比通體的全般研究方式，還有更大的史學意義；涉及範圍上不完全的著述，比之包羅詳盡的著述，有的還更有價值。

本來，經濟學說之歷史的研究，也如其他一般歷史一樣，要經歷蒐集資料，編排資料及依一定史學原則處理資料的三個階段。但這三個階段，不但不同前述三研究方式相照應，且須破除一般極形式的認識。比如在部分研究方式中的昂格爾的「二十世紀的經濟學說」，和在通體研究方式中的韓訥的「經濟思想史」，至多也只有對我們提供一些零片史料的貢獻。至於把已有的學說思想，或者按照時間的順序，或者按照國別，或者按照派別，分別編列出來，在形式上講求整齊，而全沒有一個基本原則，將其系統貫串起來的著作，無論是部分的或是全般的，都不曾超越編排的研究階段。桑巴特(Sombart)批評路易·柯沙(L. Coase)所著「經濟學說史」(Historic des Doctrines Economiques)謂其所定系統(一)零簡時期，(二)理論及經驗的學說，(三)科學式的學

說時期，雖極整備，但其申論，則雜亂無章，終而完全以年代及地域為準，將十九世紀中之一切學說，均先就國而爲之區分，更在每國之內，各按學說發生之年代前後加以論列（見王譯「經濟學解」第十三頁）。其實桑巴特對柯沙的評語，可以完全應用到上述史盤、斯各特，乃至因格拉姆和基德、里斯特的著作。史盤的學說，乃完全由其浪漫主義的奇特成見所編織而成。因格拉姆的著作，尚不失爲精審，但歷史學派的錯誤見解，隨在可見；而其所採行之分國研究法，更失之支離破碎。基德與里斯特的合著，一般似較有好評，但全書各部分，仍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基本原則；而對卡爾·馬克斯的評論部份，不但簡略，且似全未涉獵其被評論者之著作，致在基本概念上錯誤百出。至於斯各特那部「完全」大著，實極教科書庸俗膚淺之能事。凡此種種，都說明諸如此類的著述，即使在應用經濟學史或經濟思想史的名目，而迄未包括的系統的進入學史的研究階段。

二

把政治經濟學當作對象而研究其發展的歷史，要由形式的編述階段，進到科學的系統的研究階段，那不僅是關係研究者學力或其經濟學修養的問題，同時還更是關係研究者社會立場或其研究出發點的問題。一個研究出發點或其社會立場極其正確的學者，雖然不一定就可寫出一部很好的政治經濟學史，但一個對各家學說分別都有相當造詣的學者，如其他爲社會立場所限制，對於某一側面研究，即對於某一家某一派某一方面的說明，即使可能有所成就，可是他決無法寫出一部科學的系統的經濟學史。爲什麼呢？

政治經濟學史是以政治經濟學爲研究對象；政治經濟學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爲研究對象。在一切社會科學

中，也許可以說，政治經濟學是最容易表現階級偏見，或最容易表現資本主義社會的偏狹性的。如其說，一個站在擁護資本主義立場的經濟學者或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很不易認清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本質，從而，極難澈底的把握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那末，站在擁護資本主義經濟立場的經濟學史研究者或撰述者，他對各家各派的學說，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理解，若進一步要他依據正確的歷史方法，很客觀很科學的把各家各派的學說系統組織在一個學史形式的大全體中，那不是難上加難麼？

不論那一位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期，即使是處在較有科學研究自由的歷史階段，且即使是他的理論，已經被一般譽稱為「經典」，他也很不易具有一種明確而透澈的歷史觀。像亞丹斯密、李嘉圖一流經濟學大師，他們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由封建制轉化來的史實，雖然也在某些場合提論到了；特別如斯密，他甚至強調那種轉化的必要，但正如卡爾馬克斯所說，資產「經濟學者有一種特別的方法。在他們看來，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自然的。……歷史，以前是有的，但現在不再有了。」（註——見「哲學的貧困」，轉引自郭王譯「資本論」第一卷第四二頁）把資本主義制度看為自然的、理性的、永恆的東西，彷彿歷史就到資本主義時代終止了。不錯，在資本制發展的後期，雖然在資產者經濟學陣營內出現了一個歷史學派，可是，正因為他們也是資產者的，他們就只能照應着落後德國的保護要求，提出各種各色的皮相階段論，玩弄着歷史名詞，實在不會接近何等歷史法則；到後來，他們甚且爲了對付德國躍起的勞動階級運動，爲了對付德國勞動階級所由激勵奮發起來的唯物歷史理論，而企圖以心理學、倫理學乃至文化學爲藻飾經濟史料的研究，來曲解歷史，並提出各種不三不四的社會政策，冀以阻遏歷史的必然。然而，在階級鬥爭的威

脅之前，強調歷史和承認資本主義宿命的缺陷，實不啻予社會主義派學者以口實與便利。所以，在差不多與歷史學派同時出現的奧大利學派，他們就適應着後期世界資本主義的比較一般的要求，而再回過頭來強調前期古典經濟學者們的普遍主義和永恆主義。如其說，在資本主義向上發展期，不明瞭資本制也有它的沒落歷史命運，是有些近乎天真；而在資本主義後期，在資本主義已由它內在發展的矛盾，暴露出致命危機的階段，尚不懷疑其永生，那就確有些近乎矯飾。也許就因此故，同是主張經濟學的絕對妥當性，在面對着封建傳統行使理論鬥爭的古典學者，確還有他們進步的歷史意義，而在面對着新興勞動階級行使理論鬥爭的奧大利學派，他們就極不易自圓其說的在扮演着保守的反歷史的角色了。我們由此知道：（一）在嚴格的經濟科學上，只有古典經濟學才是它的主體，歷史派、奧大利派經濟學，都不過是末流或派生的傍枝。（二）到今日為止，資產的經濟學者，大體不屬於古典學派，就是屬於歷史學派；或奧大利學派，或其更進一步的變種。（三）如其說經濟學史學者，同時必得是一個經濟學者，是一個屬於上述諸派系的學者，而在時間的限制上，更可能不是古典學者（因為嚴格的政治經濟學史，不能產生在經濟學發生發展期，而必得在經濟學的沒落期）或更可能是歷史學派、奧大利派學者。比如，在我們上面舉述的幾部有關經濟學史的著作的作者，如寫「英國經濟學史」的羅雪爾，寫「重商主義」的希莫婁，寫「政治經濟學史」的因格拉姆，就是屬於歷史學派的；又如寫「經濟學說史」的基德和理斯特，寫「經濟思想發展史」的斯各特，就是奧大利學派的共鳴者。（四）他們既然誤解歷史歪曲歷史，既然有意無意把資本制度本身看成不能由其他制度代置的東西，要他們對於他們以前的、他們周圍的，乃至他們自己一派的經濟學說的發生發展歷程，有一個允當的系統的安排，那是可能的麼？

不但此也，缺乏正確的歷史觀，並不止於寫不出系統的學史，就是對於某家某派學說分別的研究，也大有問題。比如，我們如其把資本制也看成封建制或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是一個歷史過程，我們就必然會去探索歷史發展演變的基本動因，或者就必然會在以往經濟學研究中去發現去體認何者為歷史發展演變的基本動因，因而乃可很客觀的在一家一派學說中，或在諸家學說中，斷定其孰為正確、孰為背謬，孰為重要、孰為次要，孰為主流、孰為傍流。能這樣，各家各派學說，乃在一個大的體系中，各有其適當的應得地位。反之，如不從這種歷史的觀點去研究，即不把社會發展的基本因果法則作為衡量各家各派學說的準繩，那就顯然不免要用主觀臆斷去代替客觀評價，即使費畢生精力，專攻一家一派之理論，如所謂亞丹斯密研究專家，里嘉圖研究專家，或重農派研究專家之流，他們儘管對所研究的對象，有了通透的熟識，但却極可能始終把握不到其中的重點或核心。引申來說罷。資本主義經濟，是以商品生產的經濟組織為其最本質的特徵，在這種經濟組織中，把勞動力當作商品買賣的事實，和勞資雙方利害對立的事實，一直在發生支配作用。從而，勞動價值學說，以及依勞動價值學說展開的利潤學說與工資學說，使成為經濟學上最關重要的核心部分。商品生產愈發展，勞動力買賣愈成為普遍的無可避免的事象，勞資間的對立關係，也就因為勞動價值法則與利潤工資諸法則的作用，而變得更尖銳，更多矛盾衝突。可是，資本社會初期的經濟學者們，儘管在勞資對立尚未尖銳化的階段，即在勞動階級尚不會從正面威脅資本家階級的階段，為了反對封建傳統束縛，而從生產關係裏面，從生產過程裏面，發現出了勞動力買賣的事實，發現了勞資利害衝突的事實，並由是揭發出勞動價值法則，和古典的工資利潤諸法則，可是，他們仍因研究上或者更因階級利害上的限制，而不會很透澈的把勞動價值學說發展到剩餘價值學說

的田地，以至朦朧利潤的來源，而在勞動價值學說上，從而在分配學說上，留下了不少漏洞。其後繼者甚且多方撫拾一些皮相的流俗的見解，去加以遮飾或彌縫。在十九世紀中葉前後，站在社會主義立場的批判經濟學體系出現了。馬克斯、恩格斯一方面指證出古典經濟學的諸般缺陷，但同時却把它在價值學說分配學說上的合理部分，分別發揮發展成爲有利於勞動階級的精神武器。這一來，原已隨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而逐漸茁壯起來的勞動者階級，就如虎附翼的變爲更大的社會威脅。結局，資產階級的驚恐，立即反映爲資產經濟學者的張皇。歷史學派不敢從正面接近古典學者的勞動價值學說，而一味反對其方法論；奧大利學派却又利用古典學者的方法論來反對其價值論。爲了對抗勞動階級的威脅，爲了阻遏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他們竟不惜把資產階級在前期當作理論武裝的諸種古典學說，全盤斥爲謬誤。於是，經濟學不僅是被「改造」了，簡直是被「代替」了，生產者經濟學，被代替以消費者經濟學了。動價值學說，被代替以限界效用價值學說了；依勞動價值學說展開的分配理論，被代替以依主觀價值學說編造成的分配理論了。像這樣遠離了科學研究立場的庸俗經濟學者流，他們對於一切批判理論，他們能夠理解、能夠在經濟學史上，給予公正的評價麼？無怪像在斯各特一流人物的經濟學說史中，竟把它自己所從屬的奧大利派的經濟學，當作是「經濟學的再生」，而在當代許多有名的經濟學著述中，亦都毫無分寸地把經濟學的末流，當作是經濟學的正體了。

三

但我們得把論點折回來：資產經濟學者或資產經濟學史家，因爲社會立場的限制，不獨不能全面的理解一

般經濟理論的發展，且也無法分別理解各家各派乃至自家自派學說及其歷史地位，然則站在同情或代表勞動階級社會立場的經濟學者或學史家，他們也不會因了同一的階級利害關係的局限，以至在其研究或認識上發生一些不正確的評判麼？事實上，許多資產經濟學者，早就準備好了，或早就在重複着一套意見，說卡爾·馬克斯的全般理論，是爲了支持勞動階級利益而「編造」出來的，即把他的經濟學，當作是爲了達成社會主義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把他的社會主義，看成經濟學研究的結論。因此，在資產者的經濟學者看來，以階級偏見妨礙經濟學或經濟學史研究的，倒不是他們自己，而是一般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了。

然而，不管聰明的資產學者怎樣會歪曲的反唇相譏，如其我們能明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社會立場的限制，對於後期資產經濟學者，比之對於前期資產經濟學者更爲厲害，我們就有理由相信：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就比之站在勞動階級立場，更爲發生不良影響。在本質上，勞動階級的社會運動社會意識，根本就是反自私自利的，反觀念主義的；他們的階級性，是從反資本主義的意識上取得的，一旦資本主義制度覆亡，資產階級不復存在，他們就不再是當作一個社會階級出現，而是當作更包羅的社會全體出現，或者是以真正的人類姿態出現。我們即使把這些關係階級歷史性的問題，拋開不講，在勞動階級還是當作一個社會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場合，特別是當作一個進取的新興的社會階級向着資產階級既成統治搏鬥的場合，他們的要求，或者體現他們要求的社會意識，已經必然帶有革新的、客觀的、歷史批判的精神，而這幾種正好與後期資產者的保守主義、主觀主義、非歷史的無批判主義相對照的精神，對於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對於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一切歷史，都是在不絕除舊布新的過程中形成的。對於歷史的認識與重視，只有期之於站在革新立場的人。當資產者或市民階級尚處在被支配者的地位時，代表他們意識的所謂啓蒙學者，都爲了打破形上的不變的神權觀念或既成權威，而從哲學及各種自然社會科學方面，提出了包含有否定、質變諸變革命題的發展理念；他們各別對封建社會傳統意識所作的無情批判，使一個鋼蔽在那些舊傳統中的超歷史認識，毫無躲閃餘地的變爲陳舊而與現實生活極不相干的東西。可是，當市民學者伴隨着市民階級得意的奏着革新勝利凱歌的時候，他們就把這「歷史」忘得乾乾淨淨了。他們由革新的地位移到了保守的地位，他們也同封建社會的學者一樣，總想歷史運行到他們的時代就停頓下來。不過他們絕不肯承認他們也會像封建時代的學者那樣愚昧，那樣頑固，那樣沒有理性。事實上，我們無論如何，也得承認他們對以前神學者玄學者表示的距離，他們都在以哲學者科學者自居呢！也許正因了他們這種進步性，他們的朦蔽性就更大了，而要批判他們，要清除他們的觀念翳障，單靠前此啓蒙學者批判封建意識的那一套自然主義的歷史法寶，是頗嫌不夠的。於是對照現實，利用並發揮前此啓蒙學者古典學者的研究成果，而完成的唯物歷史理論，便被運用來作爲清算資產者哲學和科學的有力武器。賴有這武器，一切哲學與科學的歷史，始能被綱維被安置在最堅實健全的理論基礎之上。而依據這種歷史觀來檢證資產學者掩飾在科學名義下的諸種學說的健全性，就能和前此依據啓蒙學者的自然主義歷史觀來檢證各種披着神學外衣的封建意識的健全性一樣明明白白的，而不讓其有何等隱避的餘地。如其說，封建意識是比較落後的，批判封建意識，只須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就行，那麼，對付比較進步的資本主義意識，就非有較進步的唯物歷史觀不可。在這種限度內，只有站在勞動階級社會立場的學者，始感到唯物歷史觀的必要，亦只有站

在這種社會立場的學者，始能運用唯物歷史觀來考察各種社會意識的發展——在我們這裏論究的範圍內，就是來考察各種經濟學說的發展。

唯物歷史觀的最顯著特徵，就是它對於任何社會意識，都要從社會實際狀態中去探求它的根據，換言之，都不從社會意識本身，或我們的頭腦中去探求它的根據。在階級社會的實際狀態，特別是其經濟狀態，始終在受着階級利害關係的綱維和支配的限內，社會經濟意識的變動及其發展，當然需要從社會階級利害關係的演變去加以說明。可是任何站在支配社會地位的階級，正因為它隨時隨地在依着階級的榨取而得到滋養，它就最不能強調社會階級或者最怕階級理論，因而就慣於把他們的意見，安置在遠離階級、遠離歷史的形而上的觀念塵霧中，現實的階級衝突愈厲害，他們這種非階級非歷史的要求也愈強烈。反之，在其對極的被榨取階級方面，他們的要求恰好是相反的。就因這種原因，資產經濟學者，在勞資對立關係愈趨激烈的時候，他們就「先天的」不能客觀的處理經濟問題或經濟理論，而在其對極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者，却又幾乎是「先天的」非採取客觀主義的研究態度不可。

最後，我們還得指明，設依據客觀主義的唯物歷史觀的研究，則一種經濟學說，是否能釋明所在社會的基本生產方法，或能否體現出所在社會的基本運動法則，就可作為其歷史評價或批判的客觀標準？資產者社會的資本運動，或其資本價值增殖運動，顯然貫徹有我們前面已經解述過的勞動價值法則，和包括有利潤、工資、地租諸形態的分配法則在其中作用着。這諸般法則解析得愈透澈，勞資的對立關係，勞動者階級代替資產階級的必然傾向，就越發顯得清楚明白。古典經濟學派之所以受到尊重，就是因為他們分別具體而微的提出了

那些法則；他們之所以仍不免受到批判，就是因為他們對於那些法則的說明，還留下了不少需要補充的罅隙和連接不起的關節。而歷史學派和奧大利學派，也正好是依他們迴避或曲解那些法則的傍趨斜出的程度，而被視為經濟科學上的下品和末流。並且我已在前面講過，同情或代表勞動階級立場的學者，雖然因此促成其依據較正確歷史觀來處理經濟問題或經濟學說發展問題，但並不是一採取了這樣的立場，就可很輕易的成為健全的經濟學者或經濟學史學者。在有些場合，許多以社會主義為號召的思想家，他們還往往因為對上述資本社會的諸基本經濟運動及其法則，不能有透澈的理解，以至回過頭來修正原來的社會立場，或者不克堅持住原來的社會立場。所謂空想社會主義派、小資產的社會主義派乃至所謂國家社會主義派，都可作為例證。而他們在政治經濟學史上所應得的地位，也不因為他們曾經以社會主義相號召，就可占得多少便宜。一言以蔽之，各家各派學說在政治經濟學史上的評價，是看他們對於那些關係資本主義經濟命脈的資本運動法則、勞動價值法則、分配法則等等，是否有所貢獻，或者有多少貢獻。然而，像這樣一個客觀的準則，是只有站在勞動階級社會立場的史學者才必需依據，或者才可能依據的。像我們前面提舉過的河上肇、魯彬乃至羅森堡諸家的著述，儘管各有缺點，如何上肇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說發展史」，太注意各經濟學家的生活和每一論據的繁瑣考證；如魯彬的「經濟思想史」，有不少論點失之支離；如羅森堡的「政治經濟學史」，在全般體系安排上還缺欠勻整，但把任何一個資產經濟學者的自命傑作來與他們的著述相比，馬上就要顯出是沒有原則，沒有史學意義的任意編列的雜貨攤。

總之，在階級社會還待清除的階段，站在勞動者立場的經濟學史家，和站在資產者立場的經濟學史家，雖

然同是持有階級的「偏見」，但因為勞動者階級是處在求革新的地位，他們的要求，便註定是要依據辯證的唯物歷史觀，依據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組織內在矛盾衝突，去說明其經濟學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而在對勞動者階級採取保守防禦地位的資產者的史學家，却正好是要迴避這種歷史觀，反對這種歷史研究方法。他們各別對於階級利益維護的決心愈堅定，他們的政治經濟學史的撰述，便愈是兩個面目。新史學原來是無產階級求真理求解放的一種學問。在十九世紀中葉前後，這種學問雖然已由馬克斯、恩格斯第一次明確而系統的向人類貢獻出來，成為此後人類社會研究歷史科學的鎖鑰，但在階級利害障礙之前，資產階級的學者，愈來愈不敢接近它，愈來愈需要迴避它，所以到結局，這學問、這鎖鑰，便愈來愈成為社會主義學者的專用品。在這種限度內，一切有科學性的學說史，就只能期之於社會主義史學家了。政治經濟學史是更容易表現階級意識的學問，因之，這門學問的研究，雖然在某些場合、特別在各家專門的論究上，頗有負於那些比較客觀的資產學者的鑽研成果，可是它的系統的科學性的撰述，就更不能不期之於階級意識較強烈的史學者了。

四

在中國，政治經濟學是當作舶來品輸入的，政治經濟學史，自然更是當作舶來品輸入的。對於一個產業不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的國家，研究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些隔膜、研究政治經濟學史，就更加隔膜了，而在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政策之下，那隔膜顯然會便於任何觀念塵霧的散佈。可是，在另一方面，落後國對先進國所處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所處的求解放求真理的地位，却又顯示一切新科學新歷史學，將特別容易為它們